

重庆邮电大学教授、博士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

总主编 徐仲伟



“五四”运动与 中国近现代 历史哲学

WUSIYUNDONG YU
ZHONGGUO
JIN XIANDAI
LISHI ZHEXUE

张牛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重庆邮电大学教授、博士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丛书
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

■ 总主编 徐仲伟



张牛
著

“五四”运动与 中国近现代 历史哲学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五四”运动与中国近现代历史哲学 / 张牛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6.8

ISBN 7-5366-7914-9

I. 五... II. 张... III. ①历史哲学—研究—中国—
近代 ②历史哲学—研究—中国—现代 IV. K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64031 号

“五四”运动与中国近现代历史哲学

WUSIYUNDONG YU ZHONGGUO JINXIANDAI LISHIZHIXUE

张 牛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策 划: 李盛强

责任编辑: 李盛强

责任校对: 何建云

装帧设计: 吴庆渝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联谊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张: 8.875 字数: 235 千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册

定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809955 转 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重庆邮电学院教授、博士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丛书

顾 问：聂 能 陈 澍

总 主 编：徐仲伟

副总主编：孟东方 魏 钢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 进 代金平 刘 跃 陈纯柱

孟东方 张 波 肖长富 徐仲伟

唐 红 高宝柱 游敏惠 曾德高

熊志海 魏 钢

总序

徐仲伟

哲学社会科学,是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

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任用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并发挥好他们的作用与使用好自然科学人才并发挥好他们的作用同样重要。

当今时代,是一个以和平与发展为世界主题的时代,是一个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技竞争十分激烈,各种文化相互激荡的时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蓬勃发展不断前进的历史时代。在这个崭新的历史时代面前,有不少全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发现,有大量崭新的领域需要我们去认识,有许多成功的经验需要我们去总结,有许多人们的困惑需要我们去回答。秉承着光荣的使命,肩负着历史的责任,作为以信息科学为优势和特色,理、工、商学科为主,兼及文、法、医等学科发展的重庆邮电学院的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教学工作者和研究人员,为推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提高学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水平,多少年来坚持以科学的精神、

求实的态度、严谨的学风，放眼天下大事，深入改革实践，思考未来发展，不断地从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法学、管理学等多学科、多侧面、多角度开展研究，一步步地积累研究得失，形成思想的结晶，创新理论的成果。今天终于将他们的辛勤劳动以这套丛书的形式展现在广大读者面前。

这套丛书，既有经验丰富的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智慧结晶，也有不少中青年哲学科学工作者的思维成果，我们从中既可看到他们研究思考不断创造的思想火花，也能体会到其中的艰难探索，孜孜以求，即使无瑕玉互见，也能让我们去感受到他们那种攀登的艰辛与走完一段路程，达到一定目的的喜悦与欢乐。

的确，科学山峰的登临是艰苦的。道路正未有穷期。我们相信随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与发展春天的来临和重庆邮电学院自身的不断发展，他们中的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会有更多的理论著述奉献给世人。

引言

“五四”运动被看作“中国的文艺复兴”，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它所倡导的爱国、民主、科学的精神影响极为深广。特别是在思想文化领域，“五四”运动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也引发了一场伟大的哲学革命，这在历史哲学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为了更好地弘扬“五四”精神，就不能忽略这一时期历史哲学思想的状况。而有关历史哲学，国内外同行的研究或者着重建构理论体系，或者多局限于“五四”之前，对“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历史哲学方面的探讨，则很少涉及。故本书试图从中国近现代历史哲学进展的角度来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弥补学界对“五四”前后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历史哲学思想研究的空缺。另，本书所言“中国近现代”，是指清末鸦片战争以后至建国前的历史时期，跨度约 100 年。此前则为“古代”，此后可称“当代”或“现当代”。

在进行具体探讨之前，有必要先廓清一下“历史哲学”的含义和来历。“历史哲学”一词源自西方，它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要求站在哲学的高度去观察和反思历史。1765 年，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在他的《历史哲学》一文中最早明确提出这一概念。在他看来，“历史哲学”就是寻求在其整体上理解历史、理解支配历史的那些原则及它可能隐含着的意义。历史研究不应局限于搜集与编辑具体的历史事实，

而应超越纯粹事实的堆积，达到一种哲学的或理性的认识。往后，随着时代的不同以及科学观念和哲学观念的改变，历史哲学的内涵也在不断改变。到现代，基于“历史”一词的两种不同含义（一是客观的历史，指实际发生的事情，即人类过去生活的实在过程，或称历史的本体；二是主观的历史或写的历史，指对此种往事的记载及其研究模式，即历史学科，亦称历史的认识），相应地，历史哲学也被区分为两种不同类型：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思辨的历史哲学试图在历史中发现一种超出一般历史学家视野之外的模式或意义，把实在的历史或已发生的事情作为考察对象，但它不关心具体的历史细节，而是要通过把握历史的整体来揭示关于人类文明演化带普遍性的真理，又称“质料的历史哲学”或历史本体论。分析的历史哲学则致力于弄清历史学家自身研究的性质，以记述历史、解喻历史或“对已做之事的叙述”为对象，它关心的不是历史，而是历史学，准确地讲是历史与历史学家的关系，又称“形式的历史哲学”或历史认识论。为方便起见，国内有学者用历史观和史学观两个术语分别指称思辨的历史哲学（历史本体论）和分析的历史哲学（历史认识论），颇堪可取。当然，二者在内容上并非毫不相干，而是屡有交错，且与历史学及历史思想多相混同^①。本书所谓历史哲学主要针对第一种含义而言，常与历史观混用，亦可等同于历史观，意即如何从哲学本体的角度看待客观历史现象。

^① 以上参照威廉·德雷《历史哲学》1—2页，三联出版社1988年版；严建强、王溯明《西方历史哲学》前言第1—2页、正文第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以及张文杰《历史哲学综论》，《新华文摘》1999年第5期，第29页。

目 录

总序	1
引言	1

第一章

“五四”前后的古今中西之争与中国近现代历史哲学

第一节 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的发展	1
第二节 “五四”前的古今中西之争与中国近现代对历史哲学的关注	11
第三节 “中体西用”的破产与中国历史哲学的近代化	16
第四节 “五四”时期新思潮与旧传统的激战和唯物史观的传播	21

第二章

西方科学的输入与中国近现代历史哲学的新面貌

第一节 进化论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哲学的巨大影响	26
第二节 西方科学方法对中国历史哲学近代化的促进	33

第三章

从变易史观到唯物史观在中国的胜利

——中国近现代对历史规律和历史动因的探讨

- 第一节 赋予古老的变易观以近现代哲学的意义… 40
- 第二节 进化论历史观的兴衰 …… 45
- 第三节 进化论向唯物史观的转变 …… 78
- 第四节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发展唯物史观…107

第四章

从地上的“天国”到人民民主专政的建立

——中国近现代对理想社会的追求

- 第一节 对“衰世”的揭露和“古时丹方” …… 159
- 第二节 农民革命的理想天国 …… 165
- 第三节 面向未来的《大同书》 …… 171
- 第四节 严复对中西政治制度的比较 …… 183
- 第五节 孙中山尝试建构的理想社会 …… 188
- 第六节 “以俄为师”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 197
- 第七节 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形成和实现 …… 206

第五章

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变革与人的自由

——中国近现代对主体能动性的认识

- 第一节 呼唤变革的风雷与近代人文主义的兴起…215
- 第二节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实践与唯意志论倾向 …… 224
- 第三节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主体能动性的认识 …… 252
- 第四节 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和群众路线的统一…268

第一章

“五四”前后的古今中西之争 与中国近现代历史哲学

第一节 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的发展

就历史本体论或历史观来说,历史哲学古已有之。在阐述中国近现代历史哲学之前,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中国古代的历史观。

一、夏商至战国时期

这段时期人们对于社会历史演变的原因,发展的动力,基本上是以讲天道鬼神的天命史观(或叫神意史观)来解释,同时还存在着其他历史哲学思想。即便在夏朝,已有奴隶发出挑战天命论的呼声,如《汤誓》记载夏朝奴隶反抗夏桀的话:“时日害(曷)丧,予及汝皆亡。”商代思想与夏代一脉相承。西周继承了夏商的思想并有所修正,其历史观仍以神意占主导地位,但他们从殷亡的教训中感到“天不可信”、“小民难保”,因此增添了“敬德”、“保民”的内容,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之后从西周末期到春秋战国时代,周王室日益衰微,思想理论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人们对天对历史的看法都露出了新的苗头,天命史观渐趋动摇,而诸子百家的思想却异常活跃丰富,其间不乏历史哲学思想。

1. 老子返古倒退的历史观及社会发展五阶段说

老子主张的“无为而治”以他返古倒退的历史观为理论基础，他认为社会不是前进而是倒退的。《老子》三十八章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老子讲的“道”、“德”、“仁”、“义”、“礼”不仅是五个思想范畴，也是社会发展的五个阶段。老子实际上是在用思想范畴划分社会发展阶段。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的最初阶段是“道”统治的，一切纯任“自然”，是完全的“无为”。第二阶段是“德”统治的，分为“上德”（“无为”又无心作为）和“下德”（“无为”而有心作为）两个时期。第二阶段与第一阶段都又是“无为”的，所以老子不反对“德”。第三阶段是“仁”统治的，“为之”却出于无意。第四阶段是“义”统治的，“为之”且出于有意。第五阶段是“礼”统治的，“为之”却得不到响应，于是就伸出手臂来使人强就，即用强力使人服从。第三、四、五阶段都是“为之”的，都是“有为”的。老子在这里只说到“上仁”、“上义”、“上礼”的状况如此这般。没有谈“下仁”、“下义”、“下礼”的状况又是怎样，无非是说在“有为”的几个阶段尚最好不过如此，不好时更不堪设想了。

2. 孔子崇古卑今的变易史观

孔子“信而好古”（《论语·述而》），言必称尧舜，并表示“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在孔子看来，从尧舜时代而退至汤武时代再退至五霸时代，不只表现为政治秩序和道德行为上的每况愈下，更寄托着他对不同社会情状的不同的社会理想。因之无论是把历史的道义诉求等同于道德的演进也好，还是把历史的希望寄托于太平大同理想也好，在此并非线性发展的历史阶段论，有的只是向过去的回复。孔子崇古卑今的历史观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孔子认为历代礼制，后世对之都会有所修改，且越改越好。如《论语·为政》所载：“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前三代相比较，周朝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有提高，是最文明的，

所以孔子明确表示拥护西周的制度。由此可知，孔子也承认历史是发展变化的，社会的总趋势是进步的，故可“以往知来”、“疏通知远”，从历史的变化推究未来。

3. 循环史观——孟子“大人物”的历史循环论和邹衍的“五德终始”说

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孟子·滕文公》下）认为历史老是一治一乱地循环着进行下去。又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孟子·公孙丑》下）“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孟子·尽心》下）认为历史治乱的原因决定于“大人物”（“圣人”）的出现与否，而“大人物”的出现又有一定的周期，且与治乱的周期相一致。这是英雄史观和历史循环论兼而有之。此后邹衍继承并发展了孟子的观点，他的“五德终始”说是典型的历史循环论，理论上也更为严密。据《史记》和《吕氏春秋》记载，历史的变化受“五德转移”的支配，所谓五德，就是把土、木、金、火、水这五种物质存在的形式（五行）和历史过程的某些时期次第对应，并认为这是天赋予这个时期的总标志和政令、服色制度的总根据。所谓“转移”，就是用这五种物质形式相互间的一些关系，附会以解释人类历史更迭的必然性。依照他的理论，整个人类历史就是按五行相胜的顺序，一代一代往复循环的。如黄帝得土德，“其色尚黄，其事则土”；代之而起的夏是木德，“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以此类推，殷为金德，周为火德，而未来取代周的将是一个得水德并按“其色尚黑，其事则水”原则行事的王朝。邹衍恪守“五行相胜转用事”的原则，用常人易于理解的“五行相胜”的某些实在性附会历史更替的必然性，论证比孟子有力，也不必担心经受验证，没有时间限制，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影响极大。

4. 商鞅与韩非的历史进化观

在论及国家的起源、思想意识的变化等问题上，法家突出地表

现为历史进化的观点。商鞅曾把古史分为“昊英之世”、“神农之世”、“黄帝之世”，并描绘了社会进化的过程。《商君书·开塞篇》又分“上世”、“中世”、“下世”，总结了大约相当于西周、春秋、战国这三个阶段的政治特点：“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韩非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等人的观点，认为历史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而不是永恒不变的。在《韩非子·五蠹》篇中，他把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当今几个阶段，认为每一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各不相同。上古“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于是有巢氏“构木为巢”，因“食果窳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于是燧人氏“钻木取火，以化腥臊”。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渚”。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同时，他还从历史进化的观点引出厚今薄古的主张。认为当今时代不同于古代，治理当今社会的办法就应与古代不同，所以“圣人不可期修古，不法常可”，进而把历史进化观点作为推行变法改革的依据。商鞅和韩非的这类观点，都努力从客观历史过程去肯定历史的变化发展，肯定古不如今；在阐述历史过程中，又注意到不同时期的特点而给予阶段性的划分，在当时都是相当进步的。

二、秦汉至南北朝时期

这个时期的历史哲学一方面是封建正统的天命史观占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则出现了王充、仲长统等唯物主义思想家，历史进步思想得到确立，并开始对历史动力给以较为科学的解释。

1. 封建官方的历史哲学——董仲舒的“三统三正说”

“三统三正说”承袭了“五德终始说”的循环论思想并加以改造，以“改正朔”、“易服色”说明历史的变迁和朝代的更迭。每个新王朝开始，都要重新规定轮流采用寅、丑、子三个月为岁首（正月），以寅月为岁首的，为“建寅”，尚黑，称“正黑统”；丑月为“建丑”，尚白，称“正白统”；子月为“建子”，尚赤，称“正赤统”。于是每个新王朝都改



服制，并轮流使用黑、白、赤三种服色。如夏建寅，为黑统，商建丑，为白统，周建子，为赤统，代周的朝代必建寅，为黑统，周而复始循环下去。不过，董仲舒所说的“三统”并非历史转变的动力，只是“新王受命”的一种标志。“新王受命”完全是“天意”的决定；表现“天意”的“道”是永恒不变。因此他说：“王者有改制服之名，而无易道之实”，“天不变，道亦不变”，提倡“奉天而法古”，究其实是一种复古的循环的天命史观，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维护其统治地位的御用思想工具。

2. 司马迁进步的历史观

司马迁主张用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观点去考查国家成败兴亡的道理，他在《报任少卿书》中阐明自己著述《史记》是为了“稽其成败兴废之理”，是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进化观点来观察历史。所谓“天人之际”，是指天道人事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通古今之变”，是要指出古往今来历史事实的发展变化、相互联系及其原因，以作为当今的借鉴。司马迁重视人的作用，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不应当是神或人神杂糅的历史，而是人的活动史。因此在写作时，他抛弃了传说中的神话成分，注意把附会在历史中的神意清理出去，还根据具体情况指出神秘学说的起因，力图从社会本身去解释各种现象，坚持人类自己创造历史的观点。司马迁也认识到了物质生产对社会生活所起的重要作用，在探讨国家治乱兴衰的变化时，明确地把它和经济状况联系起来，从经济角度来寻求历史发展的原因。同时，司马迁还试图用经济条件说明人们的社会地位、思想意识和政治制度。这是一种朴素的唯物史观。

3. 王充自然宿命论的历史发展观

王充将其天道自然的宇宙观应用于人类社会领域，提出了以自然宿命论为主要内容的历史观。他在《论衡》中说：“国之存亡，在期之长短，不在于政之得失。”（《论衡·异虚》）又说：“成败系于天，吉凶系于时”，“昌衰兴废，皆天时也”，“国之安危，皆在命时，非人力

也”；“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论衡·治期》）可以看出，王充借此反对天人感应和神权政治的历史观，用自然的原因直接说明社会现象，认为国家的治乱、王朝的兴亡是一个自然变化的过程，如同四季的更替和生死的推移一样，有其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具有唯物主义的精神。但是，他把这个规律说成与人的贤愚、善恶无关的“期”、“数”、“时”、“天时”等等超世间的东西，以为社会的治乱与政治的好坏完全没有关系，最终却陷入了历史的宿命论。另外，在历史发展观上，王充的思想也是矛盾的。一方面，他竭力反对俗儒“尊古卑今”、“褒古毁今”、“贵所闻而贱所见”、“少所闻而多所见”的谬论，提出了“周不如汉”的历史进化观点；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古今不异”、“百代同道”，重蹈历史循环论的覆辙。

4. 仲长统注重人事的历史治乱观

仲长统认为，社会历史不是一成不变的，人们统治地位和被统治地位的划分经历了一个形成、保守和瓦解的过程；社会历史的这种演变过程，不是由“天”神的意志决定或主宰的，而是社会是现实的“人事”努力和起作用的结果。他在《昌言》的《理乱》篇中说：“豪杰之当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无天下之分，故战争竞起焉。晴斯之时，并伪假天威，矫据方国，拥甲兵与我角才智，程勇力与我竞雌雄，不知去就，疑误天下，盖不可数也。角智者皆穷，角力者皆负。形不堪复仇，势不足复较。乃始羈首系颈，就我之衔继耳。”认为“天命”乃是角智、角力的最后的胜利者，是通过战争获得的。所谓“天威”，则是斗争双方为加强自己、战胜对方所使用的手段。他把社会历史的发展概括为从“乱世”到“治世”再到“乱世”的过程，认为其中的“乱世长而治世短”（《后汉书·理乱》），而且基本的趋势是越来越乱。在他看来，社会历史的发展无论在形式上或内容上，都是“治”“乱”相继、周而复始地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史。



三、隋唐五代宋元时期

由于佛学的兴盛，这一时期的历史哲学，不管从哪个角度去认识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其中既有韩愈、朱熹这样为反佛排佛而清理道统、独尊天理的封建卫道士，也有柳宗元那样亲佛崇佛却注重历史发展趋势的进步思想家。

1. 韩愈的圣人史观及道统论

韩愈以反对佛道教著称，他提出了道统论、性三品说和天命论等思想，三者通过“圣人”相互联结起来，构成一个统一的体系。在韩愈看来，“道统”中那些大圣人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等，都是天生的。天生圣贤，赋予他们上品的善性和超人的才智，并不仅仅是为他们自己好，同时还要通过他们建立纲常，施行教化，传道授业，以补救万民的不足。他在《原道》中说：“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壹（通“湮”）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疆梗（刚猛）”；“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总之，人类之所以能存在并有巨大的发展，都是能够发明创造的圣人的功劳，有了天生的圣人才有了道统，才有了人类。韩愈的圣人史观和道统论，与孟子“大人物”的英雄史观一脉相承，实质上仍是一种唯心的天命史观，但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柳宗元重“势”的进步历史观

柳宗元继承了荀况、王充等的唯物思想，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存在着固有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趋势。他说：“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